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研究丛书

南北贸易再认识

——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
和新贸易理论的综合

NANBEI MAOYI ZAI RENSHI
GUBIAN MAOYI LILUN XINGUDIAN MAOYI LILUN
HE XINMAOYI LILUN DE ZONGHE

谭立力 著



科学出版社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研究丛书

南北贸易再认识

——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综合

谭立力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通过在新贸易理论模型中引入传统贸易因素，首次建立一个综合技术差异、资源禀赋差异和规模经济三种贸易因素的一般均衡框架，并在这一框架下得到地区工资差异（产业分布）随贸易成本下降的四种不同的演化模式，为当前相关实证研究中存在的分歧提供一种可能的理论解释。进一步，本书利用建立的综合框架，分析一类特殊的由环境政策差异导致的比较优势，及其与集聚经济力量的互动，揭示我国“污染西迁、高技术产业东移，工业产值向东部集聚”现象背后存在的一种理论机制。

本书可供国际贸易、区域经济、产业经济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和相关领域的政策制定者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北贸易再认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综合 / 谭立力著. —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9

ISBN 978-7-03-045641-0

I. ①南… II. ①谭… III. ①贸易理论 IV. ①F7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5589 号

责任编辑：杨 岭 孟 锐 /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校对：陈 靖 / 责任印制：余少力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成都创新包装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年9月第一版 开本：B5

2015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7.75

字数：160千字

定价：49.00元

总 序

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西方，经济滞胀和政府失败的出现，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府管理改革运动。这场政府改革运动随之在世界范围展开，至今，仍在世界范围内以特有的方式深入。

从政府管理的角度看，这场政府改革运动与传统的政府改革最大的不同，不仅仅在于基于现实条件下更加深入地认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确定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即解决政府干什么的问题，更在于在行政职能的输出方式，即政府的行政方式上进行探索，着重解决政府如何干的问题。这一场政府改革中解决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履行好自己的职能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是整个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和重大突破，其基本逻辑，是在强调政府管理的目标与价值的基础上，加强对公共产品属性的认识，确认私人和市场参与公共产品生产 and 提供的必要与可能，进而创新政府管理的方法与技术，在现实中整合社会资源以满足公共需求^①，从而回应公众基本生活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治理传统的政府难以应对的问题，即政府机构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政府存在的基本要求，就是处置公共事务以满足公众需求，促进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而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方式，就是公共管理模式，它由公共管理过程中各公共产品提供者功能的定位、参与程度和参与方法等基本要素构成。在人类已有的公共管理实践中，主要出现过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中政府为主并有限投入的公共管理保护模式、政府全面负责乃至完全垄断的干预模式、政府与社会和市场合作的市场模式^②。因此，公共管理模式本质上是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存在或可供选择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分工方式。无疑，自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以后，以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干预为起点和标志，随着行政国家的出现，在政府作为公共事务主要甚至是唯一管理者的情况下，现实的公共管理模式就是典型的干预模式或垄断模式。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政府管理的变革，现实的结果就是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公共管理市场模式的出

① 崔运武. 当代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与政府责任[J]. 思想战线, 2005, 1.

② 郎佩娟. 公共模式研究[J]. 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02, 20(1).

现和成长。^①正是在这一现实变革的基础上，基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尽管人们对当前是否已有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的新的公共管理理论的出现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由于现实变革的推动，和新的公共管理理论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基于对范式的深入理解，认为即便不提公共管理已是一个新的理论或学科，但至少已是一个正在成长的新的研究范式。这一点，在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教育部规定的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以及近期社会科学研究及管理部門的及时调整中足以说明。

在当代中国，自1993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展开以来，可以说正是得益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公共管理模式的转换已成为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概言之，这一客观进程的内在逻辑是，一方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导致了公共需求的日益丰富和复杂，对政府公共管理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正是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使作为公共管理模式从干预走向市场的重要因素——以民间组织或非盈利组织为基本组织形式的社会(公民社会)，相当程度上从无到有，不断发展，而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时地认识了当代中国的公共需求的发展变化，把握了公共管理发展的内在逻辑，因而随着改革的深入，提出必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来确定政府职能，必须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并且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民间组织发展的方针和政策，要求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出要努力提高公务员的现代公共管理素质，建立一个既与当代公共管理发展总体趋势相一致，又符合中国特点的新型公共管理体制。一句话，当今中国，公共管理模式的转换应该已是一个不争的现实。

正如同当代西方的“新公共管理”在实践上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或说公共管理有明显的不同，因而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形成了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重大变革，进而形成“新公共管理理论”一样，当代中国公共管理模式的转换作为一种在中国出现的客观现实，一种在中国未曾有过的新的公共管理实践，它为能够对这一实践做出解释并做出进一步改革导引的理论的构建提出了要求。正因为如此，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领域，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公共管理研究已成为一个理论热点，一个正在探索的理论面向现实的重要领域。

二

在当代中国，对公共管理理论的探索，我们认为基本目标有二：

^① 崔运武. 公共事业管理概论[M]. 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第一，总结研究当代世界的公共管理变革和理论发展。具体言之，即审视当代世界范围内，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政府管理改革先行国家公共管理改革的实践，总结其经验和教训，研究其新公共管理理论之所以产生的动因、理论发展的脉络，如从管理主义、公共选择理论，到新公共管理理论，再到治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内在的发展逻辑与现实影响因素。在把握当代世界范围内公共管理变革的基本趋势，追踪理论发展前沿的基础上，探求公共管理中具有普适性的因素，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原则，促进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变革及理论的发展。

第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能对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有解释、说明和预测的公共管理理论。当代中国的公共管理，是对当代中国公共事务进行协调和控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在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发展，在当代中国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的，是公共管理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管理模式。因此，对当代世界范围内公共管理理论的追踪和研究，归根结底，就是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理论，尤其是要通过这一理论的探索和建构，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而持续地增长，社会稳定，民主进步，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得到满足，公众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这一“中国模式”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说明，为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基于公共管理做出有价值的参考的预测。

如何展开这一探索，从理论建构的角度看，我们认为最基本的就是要在学科综合的基础上来进行。当代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正如人们所公认的，当代正在成长的公共管理理论，它的关注焦点由“内部取向”转变为“外部取向”，由重视机构、过程和程序研究转到重视项目、结果与绩效的研究，从而使战略管理、管理的政治环境、项目执行、绩效评估、公共责任及公共管理伦理成为核心问题；它倡导的管理理念，其中心问题的“如何提供公共利益和服务”，它提供的一整套管理的方法和技术，则是十分注重在处理公共管理问题，尤其是政府与市场、企业与社会关系时，提供一整套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新思路与新方法。

而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并形成一种较完整的知识体系，则是由于它的知识基础，即公共管理学作为一种广泛和综合的知识框架，把当代经济学、管理学、政策分析、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融合到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研究中。因此，要追踪研究当代世界的公共管理知识，尤其是要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共管理理论，必须走一条基于以政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又不局限于政府，以公共行政学为基本视野，但又必须同时关注相关的多学科，即基于以公共事务管理为核心，基于公共管理又必须逸出公共管理，逸出公共管理又必须回归公共管理的多学科研究路径。

三

云南大学在国内对公共管理理论的探索者的行列中，不是先行者，但肯定是一个积极的、孜孜不倦的参与者。

云南大学有较悠久的历史和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研究历史。1923年云南大学正式建立后，即于1925年建立了政治学系，展开了对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云南大学的政治学和行政学走过的是和其他兄弟院校一样的历程。改革开放后，云南大学迅速恢复了政治学学科，并于20世纪80年代初结合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办了少数民族干部行政管理大专班。这一行政管理干部大专班沿至90年代末，在为云南省培养了大批合格的素质不断提高的少数民族行政管理干部的同时，也促进了我们对行政管理理论和教学的探索。1986年，云南大学获得了政治学理论硕士授权，即在专业中根据当时学科划分的要求，开设了行政学方向，培养行政管理方面的高级专业人才。随之，在国家学科专业调整，明确地建立行政管理专业后，云南大学先后获得了行政管理的本科专业和硕士点授权，开展了行政管理的专业教育。

1999年，世纪之交，世界范围内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和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步深入，使正在成长的公共管理学科，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针对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感觉到了时代的脉动，以及公共管理这一高度整合的新兴学科必将成为社科领域的一个显学，一个极为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的巨大需求，云南大学依托学校既有的相关学科优势资源，以原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为基础，于1999年7月正式建立了公共管理学院，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也得以成为全国第一个正式建立的公共管理学院，从而使我们对公共管理理论的追踪关注，对新型的具有公共管理理念、掌握当代公共管理技术和方法的多学科的交叉型、复合型、应用型的人才培养，有了坚实的学科平台和新的人才培养条件。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建立后，我们积极追踪公共管理理论，展开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我们的建设战略，一是以行政管理学科建设为基本支撑，二是积极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科学研究与教学研究相结合。如此，“九五”期间，行政管理学科被列为云南省重点建设学科。在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支持下，行政管理重点学科建设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获得了一大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基金、教育部青年教师奖基金、国家新世纪重大教改项目等，支撑了整个学科建设，使学科力量不断得到发展，于2003年获得了MPA教育授权，2005年获得了行政管理博士授权，并建立了省部共建的公共管理实验教学中心。

“十一五”伊始，得益于正在深入发展的改革现实对公共管理的需求，基于

我们从“九五”开始的以行政管理为基础的学科建设，以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为目标——一个以公共管理为核心，一个更加综合的学科整合的建设，即公共管理学科建设，被列为云南省“十一五”重点建设学科。我们基于公共管理的学科特点和基本内涵，确定了公共管理理论与公共事业管理、公共政策与地方政府治理、公共经济与政府理财、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与管理、电子政务五个建设方向，从更宽广的视野或学科入手，依赖于以往建设的基本路径，展开了新的积极的探索。而在“十二五”即将启动之际，根据以项目带动学科加强学科建设的相关要求，“区域公共服务的体制与技术及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研究”项目，被列为云南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从而使我们对公共管理理论的追踪和探索，有了新的更高的平台。

为了记录和展现我们探索的结果，我们编辑了《云南大学公共管理研究丛书》。当然，尽管当今世界已是一个信息社会，资讯的传递和使用已非传统社会可比，但由于原有的学科基础和研究力量，以及地域等条件所限，我们对当代公共管理理论的追寻和探索，难免前瞻与后顾并存、深刻与肤浅共融。但我们以为，对在一个诱人的，但实际上又充满艰难、困惑的迷宫般的思想殿堂里的探索者而言，或许同样重要的，不仅仅在于所得，还在于有一种为理想而追求的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一种为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发展贡献一得之愚而带来的创造的欢乐。

是为序！

崔运武

2010年1月5日星期二于昆明

前 言

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分别刻画了三种贸易因素：技术差异、资源禀赋差异和规模经济。然而，正是因为三种贸易理论分别专注于一个特定的贸易因素，它们的分析往往难以单独描绘出贸易世界的全貌。因此，在一个更一般的理论框架下对其进行综合，探讨各贸易因素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贸易模式的综合影响，便形成一种非常自然的理论需要。另外，南北贸易中广泛存在的产业内贸易提醒我们，在真实世界中贸易形成的过程往往是多种贸易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想要有效地分析这一类贸易现象，必须要考虑各个贸易因素的相互关系和综合作用。这为在理论上有效地综合三种贸易框架提出了明确的现实要求。本书即在一个统一的一般均衡框架下对这种综合进行一次尝试。

本书通过在一个新贸易理论模型中引入传统贸易因素，首次建立了一个综合技术差异、资源禀赋差异和规模经济三种贸易因素的一般均衡框架。通过对一个高次方程的解析分析，本书深入考察了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各个贸易因素的互动和消涨关系。研究发现，在贸易成本较高时，新古典主义资源禀赋差异较古典主义技术差异在贸易形成中起着更重要的作用，而在贸易成本较低时，情况正好相反，技术差异在决定贸易模式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也正因为这种效用强弱的不对称，本书得到了地区工资差异(产业分布)随贸易成本下降的四种不同的演化模式，这为当前相关计量研究中存在的分歧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在解析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数值模拟方法，本书将综合模型在双产业组情况下进行了推广。研究发现，在规模经济因素的影响下，新古典贸易理论预测的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消失了，两地工资呈现了持续的差异：当贸易成本较高时，出现了古典贸易理论意义下的“反常集聚”，在北方具备技术优势的产业集聚到了拥有更大经济规模的南方；而当贸易成本较低时，出现了新古典贸易理论意义下的“反常集聚”，资本密集型的产业集聚到了资本相对稀缺却拥有更大经济规模的南方。

利用建立的综合框架，本书分析了一类特殊的比较优势——环境政策差异导致的比较优势，及其与集聚经济力量的互动。研究发现，环境政策差异导致地区产业结构剧烈变动，但对工业部门总量地区分布的影响却非常微弱。这使得我们可以更好地在国际产业转移的整体背景下理解污染避难所现象，同时也为我国“污染西迁、高技术产业东移，工业产值向东部集聚”现象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本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作者衷心感谢自己的博士生导师金祥荣教授和曾道智教授，感谢博士研究期间给予作者指导和关心的各位师长和朋友，感谢在本书修改成稿过程中给予作者大量指导和帮助的崔运武教授。鉴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一些不足之处，敬请读者予以指正。

谭立力
2015年6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1
一、三种贸易理论的特征和联系	1
二、产业内贸易中的第一自然因素	3
三、综合三种贸易理论的思路和意义	4
第二节 研究的目标和方法	8
一、研究的目标	8
二、研究的方法	8
第三节 研究的内容与框架	9
一、研究的内容结构	9
二、研究的技术路线	10
第二章 贸易理论的发展与综合	11
第一节 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	12
一、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13
二、对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批评	15
三、新贸易理论	17
第二节 新贸易理论的不足和嵌入传统贸易因素的需要	21
第三节 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综合	25
一、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26
二、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	28
三、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	33
第四节 小结	37
第三章 南北贸易中广泛存在的产业内贸易：现实描述	39
第一节 引言	39
第二节 产业内、产业间贸易份额及其变化趋势	41
一、中国、印度和巴西：来自代表性发展中国家的数据	41
二、产业内贸易在贸易结构中占核心地位	45
第三节 VIIT、HIIT 份额及形成机制	45
一、VIIT 在产业内贸易中占主导地位	46
二、VIIT 的形成机制分析	49

第四节 小结	50
第四章 综合三种贸易理论的一般均衡模型：解析分析	51
第一节 引言	51
第二节 模型	54
第三节 均衡分析	55
一、长期均衡	55
二、长期均衡解析特性	57
第四节 贸易、产业分布和工资差异的演化模式	60
第五节 小结	64
第五章 综合模型在双产业组情况下的拓展：数值模拟	66
第一节 引言	66
第二节 模型设置	68
第三节 均衡分析	71
第四节 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的互动机制：对解析模型的支撑	75
第五节 第二自然对第一自然的扭曲：与传统贸易模型比较	79
第六节 小结	82
第六章 环境政策、比较优势与规模经济：模型应用	84
第一节 引言	84
第二节 基本模型	87
一、要素禀赋和市场结构	87
二、消费者效用和企业生产技术	87
三、产品市场均衡	88
第三节 均衡及稳定性分析	90
第四节 环境政策差异的经济效应	91
一、环境政策差异在产业转移中的总量效应和结构效应	91
二、环境政策差异在产业转移中的福利效应	92
第五节 小结	93
第七章 结论和展望：南北贸易再认识	95
附录	100
参考文献	107

第一章 导 论

本章梳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基本特征和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引出综合三种贸易模型的理论需要。同时，本章从南北贸易中广泛存在产业内贸易这一事实出发，探讨真实世界产业内贸易形成过程中的传统贸易因素，引出建立新框架综合三种贸易理论的现实需求。本章对试图综合三种贸易理论的国内外既有文献进行简要评述，从而引出本书可能的创新点。对于研究的目标、方法、内容与框架，本章都将予以详细说明。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一、三种贸易理论的特征和联系

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建立在各自不同的基本假定之上。基于这些基本假定，针对贸易模式、贸易量、贸易得利等重要贸易问题，它们得出各自的核心命题和结论。然而正是由于其基本假定都仅突出了贸易事实中某一个关键方面，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对贸易问题的分析，虽然深刻，却也各有偏颇，往往难以单独描绘出世界贸易的全貌。

各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有两个，这两个原因都有助于各国从贸易中获益。第一，进行贸易的各个国家间存在差异。如同个人一样，当国家各自从事自己较擅长的生产活动时，互相间既能取长补短，又能通过贸易而共同获益。第二，通过贸易，国家能各自获得规模经济。也就是说，如果每个国家只生产一种或少数几种产品，就能相应扩大生产规模，通过规模经济，获得更高的效率，从而共同获益。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着力阐释的即是其中第一个原因——“第一自然(first nature)”。当然，它们分别是技术和资源禀赋的角度阐释这一原因的。而新贸易理论着力阐释其中第二个原因——“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 (Cronon, 1992)。

古典贸易理论确立于19世纪初，以李嘉图模型(Ricardo, 1821)为标志和代表。主流经济学派认为古典主义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是在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李嘉图认为每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各种商品，而应集中力量生产那些利益较大或不利较小的产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在生产要素总量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总量将增加，如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都有利。古

典贸易理论基本假定的核心在于技术差异导致的比较优势。经济学家对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比较优势理论揭示了国际贸易领域客观存在的经济运行的原则和规律。古典贸易理论的问世,标志着国际贸易学说总体系的建立,确立了其后贸易理论的发展方向。然而,由于古典贸易理论李嘉图模型仅考虑单一要素,结构过于简单,难以全面地分析国际贸易的原因和影响。

新古典贸易理论产生于20世纪上半叶。瑞典经济学家伊莱·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和伯尔蒂尔·俄林(Bertil Ohlin)提出了各国之间生产要素相对差异是产生比较成本差异的必要条件(Ohlin, 1933)。用要素禀赋的差异解释国际生产差异,他们认为相互依赖的多种生产要素的差异是比较优势和贸易的源泉,因此要素禀赋学说某种程度上也可看做对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扩展和补充,其刻画了除劳动生产率之外的另一个重要贸易因素。在赫克歇尔和俄林之后,经过众多经济学家的不断完善,要素禀赋理论在基于偏好、技术和要素禀赋的一般均衡基本框架中得到系统的表达,此后的半个世纪一直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绝对统治地位。按其创立者的姓氏缩写,该理论又被称为H-O理论。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作为正统和主流,从诞生起统治贸易理论近150年,常被合称为传统贸易理论。然而,战后国际贸易尤其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却呈现出许多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一方面,以著名的里昂惕夫悖论(Leontief, 1953)为代表的一大批经验研究对出口充裕要素密集产品、斯托尔博(Stolper)-萨缪尔森(Samuelson)定理、产品生产贸易密集度不变等一系列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基本假定和核心命题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另一方面,亦有一些理论文献对传统贸易理论模型的逻辑完备性提出质疑。

针对传统贸易理论的不足,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其强调贸易形成中的“第二自然”(Cronon, 1992)因素,以克鲁格曼于20世纪80年代初建立的一系列新贸易模型(Krugman, 1980, 1981)为规范化的起点,将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运输成本引入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模型框架与传统贸易理论有很大不同,但其基本假定的核心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假定单个企业内部存在规模经济;二是在产品市场中引入了独特的垄断竞争市场结构^①。具体的新贸易理论模型种类繁多,但一些核心结论是它们所共有的。首先,新贸易理论模型认为,即使两国间没有技术和要素禀赋差异,也会由于经济规模差异而产生国际贸易。这一结论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贸易的形成。其次,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企业不再采用边际定价原则,存在规模报酬的行业中垄断利润可以从出口中获得。这一结论部分地解释了国际贸易中初级产品出口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事

^① 需要注意,贸易成本(运输成本)的引入,即是空间概念的引入,这也是新贸易理论基本假定的重要方面。

实。第三,由于在连续统上多样化工业品的数目实际上是二阶无穷大,而要素种类最多为三种,两国商品专业化生产和贸易模式的形成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其形式可能是完全由偶然性的历史因素和政府计划所决定的。

在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中,还有两个热点值得我们关注。一个是以 Melitz (2003)著名文献为先导和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另一个是 Eaton 和 Kortum (2002)提出的 Eaton-Kortum 模型。虽然两类模型建立的初衷各有不同,但从其逻辑内涵的角度出发,我们仍然可以把它们看做是对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某种综合,从而将其纳入本书综述思路。

二、产业内贸易中的第一自然因素

当然,正如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由于仅考虑“第一自然”而难以全面地解释国际贸易一样,单纯的新贸易理论模型由于仅考虑“第二自然”,同样难以全面地解释贸易的形成。特别是当我们关注南北贸易中产业内贸易的时候,仅依靠新贸易理论的模型工具,很难做出有效的分析。新贸易理论模型在基本假定中忽略国家间技术和要素禀赋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其认为这些“第一自然”差异在逐渐成为国际贸易主流的产业内贸易中并不重要。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比以往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却发现,在产业内贸易的形成中,生产技术、资源禀赋差异等传统贸易因素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随着新兴国家的飞速发展,传统上主要以技术和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南北贸易中产业内贸易的比例不断上升。这种发生在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间的产业内贸易占世界产业内贸易总量的比例不断提高,使得我们很难在讨论产业内贸易时,继续忽略传统贸易因素的作用。

Aturupane、Djankov 和 Hoekman(1997)的一项研究较早对水平型产业内贸易(horizontal intra-industry trade, HIIT)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vertical intra-industry trade, VIIT)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他们分析了中东欧国家和欧盟国家间1990~1995年的产业内贸易数据,发现经过东欧剧变,这一时期中东欧国家同欧盟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增长迅速。进一步他们还发现,这些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的确主要是传统贸易因素。随后进行的针对美国及其发展中国家贸易伙伴的研究,亦证实了以上来自欧盟数据的结论。Clark 和 Stanley(1999)分析了美国和其发展中国家之间产业内贸易的决定因素。他们利用的是美国与30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数据,发现美国与其发展中国家贸易伙伴间的产业内贸易与规模经济之间没有明确的相关关系。进一步,他们对贸易产品的要素密集度进行分析,发现在美国及其发展中国家贸易伙伴之间的产业内贸易中存在这样的贸易模式:美国向发展中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型的高质量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而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同一产业内的劳动密集型低质量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这均表

明传统贸易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来自一些中等发达国家的数据也证实了 VIIT 在产业内贸易总量中所占的巨大比例,和传统贸易因素在产业内贸易形成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并且,与最发达国家不同,这些国家在 VIIT 中,可能对一些国家处于上游地位,而对另一些国家处于下游地位。Nuno 和 Maria Paula(2009)利用 1991~1997 年的葡萄牙的贸易数据,研究了该国产业内贸易的决定因素,证实了技术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差异对该国产业内贸易的形成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系列关于中国贸易模式的研究也证实了传统贸易因素在贸易形成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Hellvin(1996)研究了中国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国家的产业内贸易数据。他发现中国和 OECD 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主要还是基于产品质量差异的 VIIT,而不是 HIIT。王云飞(2005)利用 1992~2003 年中国与 14 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数据,对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相对市场规模和人力资本水平,与 VIIT,进而与产业内贸易都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相对市场规模和人力资本水平分别是典型的新贸易理论贸易因素和传统贸易理论贸易因素。马征和李芬(2006)同样利用中国 1992~2003 年的对外贸易数据,对中国产业间贸易、VIIT 和 HIIT 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他们认为,规模经济、需求重叠和要素禀赋相似度等新贸易理论强调的产业内贸易因素对中国产业内贸易并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相反,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国际垂直分工的发展才是推动中国产业内贸易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

对于产业内贸易,不仅当它发生在不对称经济体时受传统贸易理论所强调的技术差异和资源禀赋差异的影响,即便当它发生在对称经济体间时,传统贸易因素的影响常常也难以忽略。Fontagn 和 Freudenberg(2002)采用欧洲各国双边贸易流量价值和单位价值数据,分析了 1980~1999 年欧洲的贸易格局。他们的研究表明,在欧洲国家的产业内贸易中,传统贸易因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综合三种贸易理论的思路和意义

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分别强调了贸易形成中某一方面的原因和机制,然而正如前述众多实证研究所述,贸易模式和各贸易量的决定,往往是“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在三种贸易理论之间形成某种综合,一方面是贸易理论自身发展的一种自然趋势,另一方面,也可更好地呼应实证事实的要求。这种综合不是技术差异、禀赋差异和规模经济等几种力量在贸易形成和产业分布过程中的简单叠加,而往往是能够得出一些既惊人又极有说服力的理论结论,并对众多实证研究的争论提供更有效的解释

和支撑。然而困于技术上的复杂性，特别是在将传统贸易理论嵌入新贸易理论的领域，理论研究进行得并不十分深入和系统，相关文献也非常有限。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这两类贸易因素的综合很早便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其中由 Davis(1995)构建的赫克歇尔-俄林-李嘉图(H-O-R)框架最有代表性，该框架在没有新贸易理论规模经济因素的前提下，仅通过综合古典贸易理论技术差异和新古典贸易理论资源禀赋差异，形成了产业内贸易。Krugman 和 Obstfeld(2006)更是进一步给出了一个教科书式的统合模型，并将其称为“标准贸易模型”(standard trade theory)。在“标准贸易模型”的框架下，古典主义李嘉图模型和新古典主义 H-O 模型都成为它的一个特例。

将古典贸易理论强调的技术差异嵌入新贸易理论的一般均衡框架中去，在贸易模式、贸易得利、产业分布等核心的国际贸易问题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新颖而重要的结论，对单纯的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都形成了非常有价值的修正。Venables(1999)扩展了 Krugman 和 Venables(1996)建立的模型。新模型取消了新贸易理论的对称性假设，引入了技术差异，而这种技术差异的强度在各个产业是不同的。他发现即便存在技术差异，贸易模式也不是完全确定的，由于新贸易理论因素的存在，产业分布甚至会背离技术比较优势指向的方向。与 Venables 一样，Ricci(1999)建立了一个两地区模型，在规模报酬递增部门中，他引入了古典贸易理论强调的技术比较优势。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之上，Ricci 发现规模报酬递增部门在某一地区的集聚会降低这一地区的专业化程度，因此比较优势的加强并不一定加深专业化的水平。同时由于技术比较优势的加入，贸易成本的下降并不一定如新贸易理论模型预测的那样促使集聚加强。Forslid 和 Wooton(2003)将古典贸易理论技术比较优势嵌入了新贸易理论最经典的模型——Krugman(1991)的中心-外围模型，从而首次证明，技术比较优势的引入可以导致再分散过程。Picard 等(2010)明确提出了“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综合的概念，他们将另一经典的新贸易理论模型(Ottaviano, et al., 2002; Picard, et al., 2005)拓展到多产业的情形，并且进一步加入了古典贸易理论的技术比较优势。Melitz(2003)将异质性企业引入新贸易理论的框架，形成了“新新贸易理论”。Melitz 在一个连续统上构建了企业的异质性，而这种异质性仍然是指生产效率上的差异，因此我们也可以将这一转向看做是新贸易理论对古典主义技术比较优势的某种回归，只不过技术差异从国别或地区的角度转入了更细致的单个企业的角度。Eaton 和 Kortum(2002)建立了一个嵌入了地理特征，也即运输费用的李嘉图贸易模型。与新经济地理模型不同，这一模型假设了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从而可以在一个类似于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模型的框架下，对系统进行拟合和分析。

较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框架更加饱满，能够更全面地分析国际